

是需求还是象征?

二十四小时书店

□俞耕耘

做是对这种理念的高调响应,那无疑太过简单。事实上,它有更为复杂的价值依托、心理寄寓和空间象征追求。

有人说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在于大众晚八点后做什么,这也许有些道理。因为,私人时间里的行为往往反映真实需求与真正动机。这就像一个人工作八小时内像孔子一样遵循社会价值,八小时外才能像庄子一样自由选择个体价值。然而,如果你把24小时书店看

可借阅)?这种理由显然牵强,一个人在限定时间内只能看有限的书,正如一个帝王在夜晚不能同时临幸所有妃子。那么,24小时书店提供了怎样的“诱惑”?我想正是四大元素吸引了人们:符号、空间、消费和情调。

关于实体书店受到数字化阅读和网络折扣的双重冲击、难以维持经营的报道层出不穷。在这样的大语境下,24小时书店的长久运行仿佛不合时宜。即使存在,也只限于一线城市的少数个例。除了极少数有盈利外(如北京韬奋书店),大多数店面都是苦苦支撑。为什么有经营者在明知盈利困难、前景黯淡的情况下,还要走这步险棋?或许,夜读者和经营者都沉浸在了一种“空间想象”之中。

24小时书店既不同于午夜后家庭的私密空间,也不是夜店狂欢化的公共空间,它是一种新型的异在空间(既有乌托邦的理想寄托,又与工作、生活保持了距离,是“非空想”的现实)。“夜晚”远离压力,暂得清净的灵魂休憩,无疑给书店平添了想象另一种生存栖息的空间魔力。如果把经营者视作文化符号的生产者,更切合不过。当你置身于大都市的霓虹璀璨时,24小时书店罕见地与夜生活消费主义的地标景观并立,成为精神上的暗夜守望者。因此,读者在书店夜读,就与经营者共造了一个精神场域,让

彼此间的空间想象得到了交流实现。

然而,24小时书店又有难以解决的悖论。它对于文化符号、理想价值的追求,使它的发展走向了“图书馆化”,试图凭借不断改善软性阅读环境,促进销售经营的想法,很可能是思路的错误。大批读者会把畅销书坐着看完,放回原处,赞赏着书店的服务和环境,满意离去。然而,如果转而依赖附属经营,填补图书销售低迷,又走入了消费主义情调泛滥的泥淖。大量书店陷入图书馆、咖啡吧、沙龙和文化衍生品的混搭,用读书把交友休闲的、听讲座的、喝茶的人“凝聚”起来,唯独图书成了折旧品,卖不出去。

24小时书店在没有解决自身悖论的情况下,不打烊更增加了运营难度,可谓旧疾未愈,又添重负。更重要的是,它更多基于文化象征价值,却并未从实用价值考虑,如夜读是否违背了中国人的养生观念?它是否只是少数人群的需求?大量上班族的白日工作使得夜读并不可能。它是否以“文化理想”之名,造成了资源、人力的空耗?

大量书店经营者也许并未思考,图书和超市商品到底有什么本质差别?24小时便利店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个回答:人们对图书的需求不同于日用必需品,它是软性的,并不需要24小时的全覆盖。

【有点意思】

写作怎么就成了看脸的事业

□杜浩

近日,当当第十届书香节高端论坛请来了贾平凹、麦家、徐则臣、郑渊洁、刘慈欣等50后、60后、70后的知名作家,同时也有张皓宸、卢思浩、苑子文、苑子豪等一批90后新锐作家。在活动前走红毯环节,一些传统作家显得还有些不太习惯,如贾平凹、麦家等作家,并没有西装革履,一身休闲装就走上了红毯。与传统作家相比,鲜肉作家们则显得明星范儿十足,他们每一位都精心挑选了时尚的名牌套装,做了上镜的发型,还有的带了自己的发型师,一位在网络上人气很高的帅哥作家上台发言前甚至还补了个妆。这几位90后作家的亮相,引发了粉丝们的尖叫和疯狂,一度被闪光灯淹没……

与贾平凹、麦家等著作等身、成名已久的作家相比,这些90后作家大都只有一到两本作品出版。有记者询问麦家如何看待这些人气高、长得帅的新生代作家,麦家斩钉截铁地回答,“作家肯定不是靠脸蛋的”,“帅不帅也不是衡量作家好坏的标准”。

不能否认,当下某些年轻一代畅销书作家大多称得上帅哥,甚至有评论说现在“写作变成了一项看脸的事业”。出版界业内,有人认为“颜值决定销量”,因为帅哥吸引粉丝,粉丝们就会疯狂买书,所以年轻一代畅销书作家要么是天生的帅哥,要么精心修饰自己的外形,既要当作家又要当偶像。

的确,这些90后作家的文化人格、文学作品和影响,具有时尚化、消费化、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特征,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学理念和趣味,而他们处理文学与市场、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态度和方式,又对传统文学的格局、观念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,并在文化界引起争议,乃至一度成为文化热点。

“写作变成了看脸的事业”、“颜值决定销量”这一现象的产生,原因比较复杂,其体现的不止是文学问题,也有市场、阅读群体和阅读趣味等发生了变化的因素。但是,我们不谈这些年轻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化、思想上的贡献,而是去谈他们的“颜值”,甚至“颜值决定销量”、“颜值决定读者的取舍”、“写作变成了看脸的事业”,这是本末倒置,是文学艺术的浮躁化、消费化。

当今的文化样式不可谓不多,文化的时尚风、流行风一阵接一阵,文化的热点、焦点事件也是此起彼伏,令人眼花缭乱,但是,文化的品质与力量却大大地丧失了。眼球经济、商业价值的驱动力搅乱了文化真假,令世界更加聒噪。如今,我们谈论文化,可能谈论最多的是文化的炒作、文化的虚妄、文化的泡沫。如今,影视中这种“颜值”趣味成流行标准,阅读文化出版界“写作变成看脸的事业”,“颜值决定销量”等,不能不说就是这种文化现象的反映。

无疑,这是一个文化浮躁的社会,社会普遍存在着浮躁的心态。不仅影视人追逐着“快餐文化电影和速食文化电影的盛行”,文学领域,“写作也变成了看脸的事业”,迎合“颜值时代”趣味成为文化的一种价值标准。文化艺术生活似乎越来越与文化的美、真、深渐行渐远,我们正在失去文化艺术的真实、真诚、美好、人性、价值、思想和道德责任,而这最终便会成为文化的末路。

现代诗歌中的苟且与远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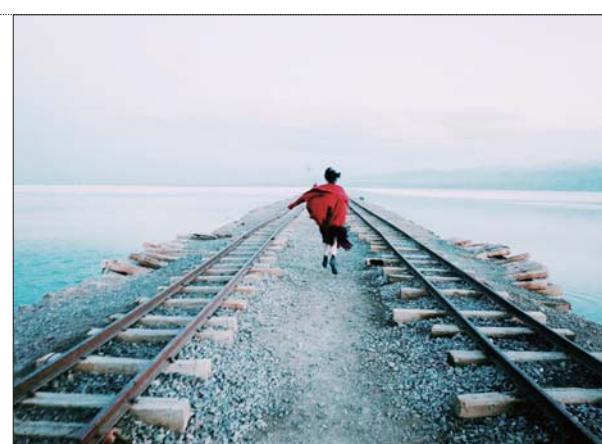
□马兵

的诗歌群体或者尝试给形体散漫的新诗重新“创格”,或者试图把西方“纯诗”的概念引进到中国,某种意义上,这都是在新诗内部重建诗歌文体尊严和高度的实践。这些实践伴随着对诗歌“散文化”与“韵文化”、“口语”与“隐喻”、“日常”与“高蹈”的争议,也内等地隐含了现代汉诗两种分裂的观念,一直到今天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第三代诗人打着“打倒北岛”的旗号揭竿而起;1999年5月,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诗人和民间派诗人的公然决裂,都与此相关。而新世纪以来,诗坛热点性的事件不断,从“梨花体”到“羊羔体”,从“下半身”到“乌青体”,从周啸天到余秀华,我们拨开污名化的尘雾和娱乐化的飞沫,依然会发现,这些事件其实也都关联对诗歌语言和主题的“苟且”与“远方”的争议。

如果说,远方对于诗歌的意义有种自治的理解,那么苟且对于诗歌意味着什么呢?诗人于坚说过这样的话:“诗呈现真实,这种真实不是时事、史实、事实、现

实,而是一种语言的真实、去蔽,是呈现人多的存在状态……在垃圾堆中生活的我们,难道能满嘴玫瑰吗?”为此,他和韩东等提出“拒绝隐喻”,就是要拆解诗歌的深度抒情模式,颠覆人们对“诗意”的传统认知,向长久以来关于诗歌的思维审美定势发起挑战。一定会有读者认为,韩东、伊沙、乌青那些过于直白、过于生活化的语言和内容与“诗意”相去甚远,读者在做这种理解时,已经隐含着一种潜在的判断,即认为只有类似中国古典诗或现代抒情诗那样富于韵味、具备音律美、思想深邃的诗作才可称其为“诗”,而这正是标榜口语写作的民间诗人要破除的幻象。因此,我们应该看到,在“苟且”的犬儒面目之下,在游戏的语言背面,也可能有着严肃的精神立场和对当下生存之困的敏感,这样的写作能有效地防止诗歌贵族化和小众化的偏失,洗刷无意义的矫情或故作高深的玄学,在诗歌中恢复生活本身的意义。

当然,话又说回来,“苟且”与“远方”不应是简单地对立,而更应该形成一种彼此制衡、互补和附着的关系。而且我们这里谈论的“苟且”绝不是指形而下的庸人逻辑,也不是要把诗歌降格为平面话语的空转。就像远方代表诗歌的想象力,代表超越和升华,代表人类对完善之境不懈怠的追求,诗歌中的“苟且”也不是人文关怀的反义词,它代表的是直面生活的勇气和真诚,是对“永恒的日常”的关注。



【所谓文艺】

□马兵